

国学基础文库

国史要义

GUO SHI YAO YI

柳诒徵 著

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国学基础文库

国史要义

GUO SHI YAO YI

柳诒徵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国史要义/柳诒徵著.

北京: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2007

(国学基础文库)

ISBN 978-7-300-08072-7

I. 国…

II. 柳…

III. 史评—中国

IV. K20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58431 号


国学基础文库

国史要义

柳诒徵 著

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

电 话 发行热线:010-88879833

编辑热线:010-88879860

网 址 <http://www.longlongbook.com>(朗朗书房网)

<http://www.crup.com.cn>(人大出版社网)

<http://www.ttrnet.com>(人大教研网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
规 格 150 mm×229 mm 16 开本 版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张 21.25 插页 2 印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字 数 204 000 定 价 29.8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《国史要义》最初于1948年2月由中华书局(上海)出版发行。全书共十篇,依次为“史原”、“史权”、“史统”、“史联”、“史德”、“史识”、“史义”、“史例”、“史术”、“史化”,各篇分别围绕一个专题,以极为赞赏的态度介绍和阐发中国的史学传统。作者对中国传统史学的阐发,并没有局限于史学史研究的范围,而是紧密结合了对中国古代社会政治、文化的探讨,并且联系西方社会文化予以对比分析,使全书成为在社会政治宏观视野下的史学理论著作。

第一篇“史原”,畅论中国历史记述和史学的起源,从传统中的文字创始人仓颉为史官谈起,叙述了周官五史的职掌、《春秋》的产生及其“三传”,特别是对《春秋》义法予以了详细评述。作者指出中国是“由赞治而有官书,由官书而有国史”,这与外国不同,决定了中国史书对政治的记载特别详细。在详细叙述了中国史学以“礼”为中心的思想形成过程之后,以赞扬的态度提出:由于“礼”为中国数千年史学之核心,“赖此一脉之传,维系世教,元凶巨慝有所畏,正人君子有所宗。虽社会多晦盲否塞之时,而史书自有正大光明之域”。这比起外国史学有很大的优越性。外国史书依时代演变各有其史观,如注重英雄、注重宗教、注重物质、注重社会,等等;中国史学则以礼为核心,凡

英雄、宗教、物质、社会这些依时演变的注重对象，都有了一个统摄的原则，并将之归于人的理性精神。孔子《春秋》以“道名分”为要旨，“道名分”就是依照礼制的治人之道，《春秋》的名教成为中国数千年联系人群之柄。外国史籍不基于礼义名教而推崇功利，故人群涣散。最后，作者极力主张今日治史仍然要本之《春秋》精神，甚至近代新闻事业也都应该“日操《春秋》之法”。

第二篇“史权”，叙述和赞扬了古代中国史官所具有的职权以及社会责任感，作者指出春秋时期史官有着尊贵的地位和职权，中国史权之尊，仿佛外国的司法独立制度，但精义有所区别。别国的权力分立往往出于对峙而相争，中国史权对政权的牵制，多出于尚德而互助。后世虽有所衰退，但仍起一定作用，对此，本书罗列了不少历史资料，叙述史官建制及其与政权的错综关系，史权对政权仍具有制约作用。从而得出“二千年中之政治，史之政治也；二千年中之史，亦即政治之史也”的结论。

第三篇“史统”，主要论述中国历史的正统论观念，叙述了在正统论问题上古今史家不同的观点。持正统论的学者对正统的标准有不同见解，如视其传授之正、种族之正、疆域之正、道义之正等不同尺度。与近代许多学者贬抑传统“正统论”的见解不同，作者认为中国历史的正统观念主张“疆域之正，民族之正，道义之正”，有深远而积极的影响，造就中国人具有的“疆域不正则耻，民族不正则耻”的历史观念。中国历史上“不甘为偏隅，不甘为奴虏，不甘为附庸”的思想，是一种政治民族主义，尤足以昭示于后代。

第四篇论述“史联”，这里的所谓“史联”，主要是指纪传体史书纪、表、志、传之间在记述史事上的互相补充、互相衬托的

关联作用。指出“史之为义，人必有联，事必有联，空间有联，时间有联。纪表志传之体之善，在于人事、时空在在可以表著其联络”。作者表彰了中国古代纪传体史书的义法之精，尤其对第一部纪传体史书——《史记》予以很高的评价。作者还以《史记》记载史事在时间、空间和事类方面的广博，以《汉书》记载地理、户口数额的详密为据，说明古代中国在史学和民政上的领先地位，责难了那种“不知表章国光”的舆论。最后，作者将史学方法问题引申到政治，认为“史之有联出于官之有联”，因此“知政而后知史，亦必知史而后知政”。

第五篇“史德”，讲史家的修养、心术，强调史家道德修养是为人之本，不是要到撰著史书时才强调“敬恕”之义。维系史德、维系史书的信实，要靠整个社会风气的端正：“若社会上下道德荡然，且无先哲垂训，决不能产生心术端正之史家。”在评价中国古代史学在“史德”方面的总状况时，作者认为“吾国史籍，自古相承，昭信核实，以示群德”。虽然出现失实的史书和失实的记载，但后来的史家必然将之改正，“吾国史德，正由后先补益，而益进于忠实”。这里，作者一方面赞同和阐发中国传统史学“信以传信，疑以传疑”的原则，同时又强调：“使其积德也不素，则其临文也无本，而挟考据怀疑之术以治史，将史实因之愈淆，而其为害于国族也亟矣。”很显然，这是在攻击疑古学派的历史考据，可见作者的基本立场主要是倾向于维护中国“历代相承之信史”，反对“卑蒯而自诬”的历史观点。

第六篇“史识”，论述不仅撰史者需要具备史识，而且读史者也要具备史识。其主要观点有：(1)中国古代史书包含着深刻的史识，有着撰著的义法，反对近人将之尽归于“史料”。(2)

史籍中的书法、取舍详略、统筹编排等都体现着史识，读者应善于从这些方面体会撰史者的用意。(3)治史者讲求史识，不但应当明了撰著的义法，还应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求得“人群之原理”，即近人所谓的“历史哲学”。作者就西方的进化论历史观与孟子“一治一乱”的历史观作了比较分析，认为进化论是片面的，还是孟子的思想深刻，因此告诫说：“故吾人治中国史，仍宜就中国圣哲推求人群之原理，以求史事之公律。”在这一篇中，作者所津津乐道的古代史籍的书法、记事取舍及古书统筹编排的体系，也揭示出作者在史学方法上的主张，全篇没有一句指出这些古代史法于今已有不适采用之处，并且要求今人不要轻看前人的知识，要先学习积累前哲之识，真正搞通之后再求创新。

第七篇“史义”，作者先泛泛考论“义”字的内容，大量引证古时关于“义”的论述。对于“史义”，通过将章学诚“史之义出于天”的说法联系到董仲舒“道之大原出于天”的见解，再以董仲舒的说法为据，将史义解释为“善善恶恶”，认为“善善恶恶”是史义的根本内容。从“善善恶恶”的原则出发，又导致了对古代“君臣之义”、“公私之义”的讲述，提出中国古代史学中的史义是以天下为公，不私一姓的，并不是专重尊君，这从《春秋》“三传”关于君无道而致弑的释例中明显地表现出来。于是作者得出结论：“吾国圣哲典训，裁制君权，实不亚于他国之宪法。”这实际上是主张将中国古代史学中的史义贯彻于当今，不但要贯彻于史学，还要贯彻于社会政治中，推行于世界，正如作者在本篇结尾所暗示的那样：“则吾史之义，岂第为一国一族之福利已哉！”

第八篇“史例”，讲古代史书的义例，对史学义例的发展作了概括叙述。作者收集了关于史籍凡例的若干资料，如《春秋》“三传”对《春秋》义例的发微，《史通》、《通鉴》、《通鉴纲目》以及清人对史例问题的阐述，等等。所谓史例，应是史籍在撰著中自觉制定的范围、取舍、体裁、书法等方面的规范，本篇收集了中国古代在史例方面的丰富资料，显示了中国传统史学在历史编纂学上的成熟状况。

第九篇“史术”，主要讲述人们从史学中所应获取的为人处事之道。“术即道也，为古今人所共由之道。然学者亦须知所择，知所遵，始不误于歧途曲径。”作者指出：中国的传统史学，其史术以儒术为主宰，“犹可以用之今日，而造福于未来”。作者对史学的作用分几层意思来阐述，一曰学史使人增长知识，取得处理问题的能力；二曰史学可以究天人、通古今，原始察终、见盛观衰。有助于知类通达，掌握治国平天下之道；三曰史学有垂训鉴戒的作用，鉴观前史可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。在论述中，举出了许多中国古代史上的实例以充实其论点，其中有些是甚有趣味的历史故事，给人以启发和激励。作者指出：史学是与“心身”、“国家”、“天下”息息相关的，因此“史术之正，在以道济天下”，这表明作者所代表的国粹主义史学宗旨，在于倚赖传统学术以经世致用的观念，并不是提倡寄情于故纸、不闻世事。

第十篇“史化”谈论的是中国古代教育与教化的历史经验，作者在这里赞扬古代的礼教，夸耀经史之学对官、对民、对少数民族等的强大教化作用，认为以往的“亲亲”、“长长”、“尊尊”及男女有别的伦理原则是不可变革的，甚至古时的教学内容、教

学方法如背诵经史之类,也有很大的优点,比新式的学校教育强得多。他还提出了外国的教育方法不适于中国的理论:“任何国族之心习,皆其历史所陶铸……吾之立国以农业、以家族、以士大夫之文化、以大一统之国家,与他族以牧猎、以海商、以武士、以宗教、以都市演为各国并立者孔殊。而其探本以为化,各有其独至。”这种传统教化方式,“固由少数圣哲所创垂,要亦经多数人民所选择”。这里的意思是说,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教育,其思想内容和方式方法既为“历史所陶铸”,亦为“多数人民所选择”,没有不坚持下去的理由。

柳诒徵先生国学功底极其深厚,且善于理论性思维。本书写作大量引证史料,并加以解析、阐发,全面、深入地把握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基本特征,甚具学术价值。资料之丰富,尤其有助于中国史学史研究者的参考。而毋庸讳言,作者的思想、立场,具有强烈的国粹主义观念,撰著发论,总以维护中国传统体制与文化为出发点。因此在学术上不免夸大传统文化、传统史学的优点,在政治上表现出守旧的倾向。这些都与历史潮流相抵牾,也是阅读此书时应当引为注意的问题。

乔治忠

2007年4月修订

题 辞

柳诒徵

漂泊西南，窃禄国校，无以诏士，爰为是书。

钩稽群言，穿穴二民，根核六艺，渊源《官》、《礼》。发皇迁、固，踵躐刘、章，下逮明清，旁览域外。抉擿政术，评鹭学林，返溯古初，推暨来叶。汲深绌短，未敢自信，庸付手民，以质有道。

出版以来，广布南朔，亦越数年，未遑砭订。今年夏秋，乃获闾示。粤秀吴生，黄冈熊叟，远道诒书，不吝是正。知我罪我，幸得亲承，荡垢涤瑕，有盼于来哲矣。

辛卯七月，劬堂自识。

目 录

题辞	柳诒徵 (1)
史原第一	(1)
史权第二	(25)
附:汉之尚书	(48)
史统第三	(67)
史联第四	(90)
史德第五	(112)
史识第六	(144)
史义第七	(176)
史例第八	(221)
史术第九	(261)
史化第十	(294)
新版后记	柳曾符 (326)

史原第一

史之初兴，由文字以记载，故世称初造文字之仓颉、沮诵为黄帝之史。

《世本》：沮诵、苍颉作书。宋衷曰：黄帝之世，始立史官，苍颉、沮诵居其职。（《初学记》）为黄帝左右史。

纪述事迹，宣明时序，推迁之久，历数以兴，故世亦称羲和、大桡之伦为黄帝之史。

《世本》：黄帝使羲和占日，常仪占月，史区占星气，伶伦造律吕，大桡作甲子，隶首作算数，容成综此六术而著调历。（《史记·历书·索隐》）宋衷曰：皆黄帝史官也。（《左传序疏》）

盖先有创作，而后人追溯而锡之职名，非当部族初兴之时，已有史官也。然经籍论文字、历数之用，皆重在施政教民。

《易·系辞》：上古结绳而治，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，百官以治，万民以察。

《说文序》：黄帝之史仓颉，见鸟兽蹄迒之迹，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，初造书契。百工以义，万品以察。

《尧典》：钦若昊天……敬授人时。

则凡民众之需要，皆恃部落酋长左右疏附者之聪明睿知以启之，而后凡百事为，乃有所率循而不紊。民之所仰，职有所专，由是官必有史。而吾国之有史官乃特殊于他族。《说文》释“史”字曰：“史，记事者也。”是为通义吾国与他族之史，皆记事也。《周官》释史曰：“史，掌官书以赞治。”此为吾史专有之义。由赞治而有官书，由官书而有国史。视他国之史起于诗人，学者得之传闻，述其轶事者不同。世谓吾民族富于政治性，观吾史之特详政治及史之起原，可以知其故矣。

《周官》：宰夫掌百官府之征令，辨其八职：……六曰史，掌官书以赞治。

国产多竹，编削为书，可执可记，可阁可藏。是亦异于他族，而言史原者所宜究也。《王制》曰：太史执简记。《国语》曰：左执鬼中。皆执竹也。与竹并用者，亦有木版，曰方。《聘礼》曰：百名以上书于策，不及百名书于方。《中庸》曰：文武之政，布在方策。《周官》：司书掌邦中之版。木版固与竹简并用，然以其不利于编排，故用竹为多。編集竹片，则名曰册。重要之册，以刀阁藏，则名曰典。司此要籍，因亦曰典。

《说文》：典从册在刀上，尊阁之也。

古史孔多，唐虞时已有五典。史克述《虞书》慎徽五典。（《左传·文公十八年》）《皋陶谟》称五典五惇，是唐虞之前，已有若干典也。五惇之义，自来未析，稽之《内则》，盖古有惇史，记载长老言行。《皋陶谟》所谓五典五惇，殆即惇史所记善言善行可为世范者。故历世尊藏，谓之五典五惇。惇史所记，谓之五惇，犹之宋、元史官所编之书，谓之宋史、元史矣。

《内则》：凡养老，五帝宪，三王有乞言。五帝宪，养气体而不乞言，有善则记之为惇史。（吾史注重嘉言懿行，盖自惇史以来即然。）三王亦宪，既养老而后乞言，亦征其礼，皆有惇史。

典册相承，历世滋多。周公诰多士曰：“惟尔知，惟殷先人，有册有典。”吾史首《尧典》，固即夏商相传之典矣。史典旧典，通知程式，记事命官，必资史以作册。《周书》克殷载尹佚筮，《洛诰》曰：王命作册，逸祝册。世存金文，亦多本史册。史册之积累者，不知凡几。今所传诵，特选择宝藏亿万中之一二耳。第竹简短狭，不能多书，一简裁二十许字。记事尚简，实缘限于工具，故必扼要而言，或为综述之语。今人以他国古代诗歌繁衍，或近世史传详赡，病吾古史之略，至诋《春秋》为帐簿式，不足称史书者，皆未就古人用竹简之时代着想。即刘氏《史通》谓叙事之工者，以简要为主，推本《尚书》寡事，《春秋》省文，亦未能说明其所以寡事省文之原也。古史官之可考者，盖始于虞之伯夷。

《大戴记·诰志》：丘闻周太史曰：政不率天，下不由人，则凡事易坏而难成。虞史伯夷曰：明，孟也。幽，幼也。……雌雄迭兴而顺至，正之统也。（孔广森曰：引之言率天之事。）

孙星衍《尚书今古文注疏·皋陶谟疏》：史公云：禹、伯夷、皋陶相与语帝前。经文无伯夷者。《大戴礼·诰志篇》子引虞史伯夷曰：明，孟也。幽，幼也。以解幽明庶绩咸熙。是伯夷为虞史官。史迁以皋陶方只厥叙，及夔曰戛击鸣球至庶尹允谐，为史臣叙事之文，则即伯夷所述语也。

夏商之史，相传有终古及向挚，皆掌图法。

《吕氏春秋·先识》：〔夏桀迷惑，〕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，执而泣之。〔殷纣迷惑，内史向挚〕载其图法，出亡之周。

《酒诰》称太史友、内史友，足证商代有太史、内史诸职，第其职务不可详。考周之史官若史佚、辛甲之伦，皆开国元老，史官地位特尊，故设官分职，视唐虞夏商为多，而其职掌又详载于《周官》。自《隋志》以来，溯吾史原，必本之周之五史。惟后世囿于史官但司记注撰著，初不参加当时行政，故于《周官》五史之职掌，若与史书、史学无关，但知溯职名所由来，而不悟政学之根本。实则后史职权，视周代有所减削而分析，而官书史体，及其所以为书之本，皆出于周也。

《周官·春官宗伯》序官：大史，下大夫二人、上士四人，小史，中士八人、下士十有六人、府四人、史八人、胥四人、徒四十人。……内史，中大夫一人、下大夫二人、上士四人、中士八人、下士十有六人、府四人，史八人、胥四人、徒四十人。外史，上士四人、中士八人、下士十有六人、胥二人、徒二十人。御史，中士八人、下士十有六人、其史百有二十人（此句特殊，载明其史，且载于府之上）、府四人、胥四人、徒四十人。

又，大史掌建邦之六典，以逆邦国之治。掌法，以逆官府之治；掌则，以逆都鄙之治。凡辨法者考焉，不信者刑之。凡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有约剂者藏焉，以贰六官。六官之所登，若约剂乱，则辟法，不信者刑之。正岁年，以序事。颁之于官府及都鄙，颁告朔于邦国。闰月，诏王居门，终月。大祭祀，与执事卜日。戒及宿之日，与群执事读礼书而协事。祭之日，执书以次位常，辨事者考焉，不信者诛之。大会同、朝觐，以书协礼事。及将币之日，执书以诏王。大师，抱天时，与太师同车。大迁国，抱法以前。大丧，执法以莅劝防，遣之日，读谏，凡丧事考焉。小丧，赐谥。凡射事，饰中，舍算，执其礼事。

小史掌邦国之志，奠系世，辨昭穆，若有事，则诏王之忌讳。大祭祀，读礼法，史以书叙昭穆之俎簋。大丧、大宾客、大会同、大军旅，佐太史。凡国事之用礼法者，掌其小事。卿大夫之丧，赐谥，读谏。

又，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，以诏王治。一曰爵，二曰禄，三曰废，四曰置，五曰杀，六曰生，七曰予，八曰夺。执

国法及国令之贰，以考政事，以逆会计。掌叙事之法，受纳访，以诏王听法。凡命诸侯及孤、卿、大夫，则策命之。凡四方之事书，内史读之。王制禄，则赞为之，以方出之。赏赐，亦如之。内史掌书王命，遂贰之。

外史掌书外令，掌四方之志，掌三皇五帝之书，掌达书名于四方。若以书使于四方，则书其令。

御史掌邦国、都鄙及万民之治令，以赞冢宰。凡治者受法令焉，掌赞书，凡数从政者。

总五史之职，详析其性质，盖有八类：执礼，一也；掌法，二也；授时，三也；典藏，四也；策命，五也；正名，六也；书事，七也；考察，八也。归纳于一则曰礼。五史皆属春官宗伯。春官为典礼之官，即《尧典》之秩宗。伯夷以史官典三礼，其职犹简。故宗伯与史不分二职。历夏、商至周，而政务益繁，典册益富，礼法益多，命令益夥，其职不得不分。然礼由史掌，而史出于礼。则命官之意，初无所殊。上溯唐虞，下及秦汉，官制源流，历历可循。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》：奉常，秦官，掌宗庙礼仪，属官有太史令丞。景帝更奉常为太常，后汉因之，太史仍属太常。此非本于《周官》五史之隶春官宗伯欤！

于此，有最宜注意之一事，即《曲礼》述古官制，大史与太宰，同为天官，典司六典。与五官之典司五众者，显有司天与治人之分。而《周官》则冢宰为天官，太史属春官，皆为治人事之官也。

《曲礼》：天子建天官，先六大，曰大宰、大宗、大史、大